

歷史記憶與香港新國際機場周邊地區之遷徙

區可屏

提要

香港新國際機場的興建，掀動了周邊地區——赤鱘角和東涌的變化，多個擁有數百年歷史的原居民村落需要遷徙，一個安頓從市區遷來的居民的新市鎮亦隨之而誕生。本文將探討遷徙以後，原居民、新市鎮居民、政府文物機關以及研究者的歷史記憶論述在這一過程中所產生的互動，及其如何影響新社區的建構。

各個社會成員透過掌控及重塑歷史記憶，重新建立社區秩序：因就官方遷徙計劃中既定「原居民」與「非原居民」身份的劃分，善於挪用社區歷史論述權的一些原居民成員最終成為遷徙後的村落領袖；當地一間村落廟宇的文物保護運動加強了該村遷徙後的社區身份認同，並影響它與東涌舊村落的融合；新市鎮精英藉着社區展覽和本地報刊重新包裝舊村落的文物和文化，建構起社區身份和社會網絡；而東涌舊村民則透過文化遺產的論述和限制新市鎮居民參與東涌神誕活動而劃清社區界線。

過去，研究香港遷徙計劃的著作經常把遷徙前的歷史與遷徙後的新生活割裂開來。筆者認為，要全面了解遷徙後社區的重塑過程，必須了解過去與現在的聯繫，歷史記憶如何被掌控與建構。跟一般社區抗拒由官方與公眾加諸其上的歷史論述不同，東涌的案例展示本土社區如何透過挪用官方論述重建自身的歷史記憶。

關鍵詞：歷史記憶、遷徙、社會身份認同、歷史論述

區可屏，現在澳大利亞一地區政府從事文化遺產工作，電郵：hoping.au@gmail.com。

一、導論

本文將引用三個個案——端婆婆、阿周及連小姐，來說明身份建構和歷史論述如何構築新的歷史理解，以及這一過程如何影響社區內的政治和經濟利益的重新分配。

1997年年中，香港電視螢幕播放了一段短片，鏡頭前一個年邁婦人正哭訴着因香港新國際機場遷徙計劃而喪失家園、流離失所的苦況。「我被逼遷出屋子，離開村落，乏人照料。」這名婦人就是端婆婆¹，觀眾對她的遭遇均表同情。電視片段歷時只有15分鐘，現實的故事卻長得多。

受到香港新國際機場計劃影響的主要地區是位於新界大嶼山的東涌。（見圖一）筆者在該地區進行研究時，認識的第一位資料提供者就是端婆婆。1997年2月，在媒體報導端婆婆的故事之前，筆者正為一本新聞周刊工作。當時，筆者參加了由香港政府機場核心小組組織的一次傳媒考察團，由政府官員帶領巡視新機場工程和旁邊的東涌。當時眼前的景象叫人驚訝，新建的巨型高廈行將吞沒歷史悠久的多個古老鄉村（見圖一）。筆者決定從東涌其中一個將要清拆的村落——馬灣村開始進行採訪，了解遷徙對該地區的影響。從香港政府機場核心小組的新聞官手中，筆者得到東涌鄉事委員會主席盧先生的聯絡電話號碼。盧先生建議筆者走訪馬灣村村領袖阿周和被沒收祖屋的端婆婆。

由於端婆婆遺失了祖屋的地契和其他官方文件，因此在遷徙計劃中被香港政府歸類為「沒擁有土地和房屋的原居民」，沒有獲得政府派給的新馬灣村的房屋。²相反，她要離開土生土長的村落，遷往東涌新市鎮的公共房屋。筆者把她的故事寫在1997年2月出版的一份新聞周刊內。電視媒體亦多次採訪端婆婆，她的故事亦開始廣為人知。

筆者在多次走訪馬灣村的經歷中，察覺到無論是端婆婆或阿周，都一再強調自身的過去及對馬灣村歷史的掌握。他們指出，馬灣村擁有源遠流長的歷史，並不斷突顯該村與整個東涌地區的緊密關係。他們的論述正是建構現在和將來生活的主要憑藉。

1 本文中所提及的東涌及赤鱸角居民的姓名均是假名。

2 本文中，「土生土長的居民」（native）泛指舊鄉落的村民；而「原居民」（indigenous resident）的定義，則根據官方的指定用法，即被香港政府承認在英國租借新界之前已經建立村落的村民的父系親屬。香港地政署制訂了一份原居民村落名單。

雖然村民們都利用過去建構現在及將來，但行動的結果卻有天壤之別。阿周遷徙後過着更好的生活，擁有三幢新樓房，並成爲馬灣村新領袖。相反，端婆婆卻被逼離開家園，在新機場附近的新市鎮重新適應生活。

端婆婆和阿周的個案推動筆者作進一步研究，希望解答以下一些疑問：新機場發展及遷徙計劃對原居該地的居民的影響有多深遠？舊有村落的社區組織及文化價值如何被動搖？在哪些社會條件下，社會成員可以利用歷史論述及歷史記憶重建遷徙後的生活？誰能成功達到目標，誰又不能？

本文集中討論東涌地區因新機場計劃而被遷徙的群體。這些需要遷徙的群體，包括原居民和從其他地區遷入新市鎮的居民，他們同樣面對種種社會問題，各自採取不同的策略重建新生活。本文的重心在於探究歷史記憶在遷徙及重建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1989年10月11日，總督衛奕信（David C. Wilson）宣佈於香港新界大嶼山赤鱗角島興建香港新國際機場，並將於香港回歸中國後的翌年開始運作。政府強調，新機場將是世界級最先進的機場之一，爲香港的繁榮揭開新一頁。

然而，香港政府並沒有同時宣佈新機場對周邊社區造成的深遠影響。當中，受影響的周邊地區主要有兩個，一是赤鱗角島，一是東涌（見圖一）。赤鱗角原是一個位於東涌對開海面的小島，隸屬東涌鄉事委員會。隨着新機場計劃的推進，這個只剩破舊村屋和一間天后廟的島嶼將被夷平，透過填海擴建，成爲新機場坐落處。赤鱗角島上約有200名村民，大多數被安置於市區，少部份則遷徙至東涌，並與東涌原居民村落融合，毗鄰爲伍。天后廟則需要拆卸，並根據原貌於東涌重新嵌建。在推行新機場計劃之前，赤鱗角小島無論在地理環境還是社區文化方面都與東涌迥異。赤鱗角村民在遷往東涌後，面對着以下問題：如何在保持社區身份認同之際，融入新社區？

在東涌舊社區，共有14個村落約100名村民需要遷徙，其中包括原居民村落馬灣村將要整條被夷平，並於壩尾村旁重建新馬灣村。龍井頭的兩間村屋及黃家圍的兩間村屋亦須拆掉，村民須搬往位於壩尾村附近的新村屋。低埔村全村被剷平，大部份村民需要遷往市區，只有一戶原居民被安置於新馬灣村。

新機場遷徙計劃開始之前，馬灣村的村落組織頗爲鬆散，宗族架構已日益衰落，與東涌鄉事委員會的關係亦非緊密。然而，遷徙計劃迫令村民重新組織起來，透過維護自身的地區身份認同，逐漸演變爲一個與政府斡旋的地區組織。根據政府的遷徙計劃，赤鱗角及馬灣村的居民，將根據「原居民」

與「非原居民」的身份劃分來安排新居所。村民根據官方既定模式，竭力爭取「原居民」的身份，以在遷徙計劃中獲享較佳待遇。

東涌新市鎮於1997年正式建成，市鎮可容18,000名來自香港其他地區的新居民。新市鎮的面貌與舊社區截然不同，設施包括地鐵站（地下鐵路集體運輸系統）、購物商場、高聳的私人住宅大廈及公共房屋。大部份社區設施仍在建設階段，新市鎮居民面臨種種社會問題，如適應新生活、家庭、教育、社區身份認同等等。

由此可見，東涌地區正面臨着翻天覆地的社會變化。不同社會能動者以各自的方式重建生活，其中一個特殊的形式，就是透過掌控及論述歷史記憶重構生活。本研究發現，不同歷史記憶的論述及其效果可以歸納為以下各種模式。

首先，被遷徙的東涌舊村落村民中，部份掌握了政府及文物機關等歷史記憶論述的關鍵，透過不斷強調自身的社區歷史、宗族發展及村落組織，獲得較理想的遷徙安置。相反，那些未能掌握官方論述或未能獲得足夠社會網絡支持的村民，往往只強調自身的家庭背景及個人經歷，忽視宗族歷史及社區組織的歷史論述，最後被逼遷離家園。

第二，對於那些需要融合東涌舊社區的邊緣居民，如赤鱗角村村民，會在歷史論述中挪用官方「原居民」與「非原居民」的身份劃分來確立一己的身份認同。與此同時，社會上關於旅遊及文物的歷史記憶論述，亦為兩個社區的融合提供了特定的社會條件。赤鱗角天后廟的搬遷與重建，在香港掀起了關於香港文物保護的討論，這些討論不但使天后廟成為象徵香港文物的指稱，亦賦予赤鱗角這個邊緣社區一定的談判能力，並影響着其與東涌社區的融合，令東涌與赤鱗角兩個社區之間存在着鴻溝，社會界線亦清楚劃分。

至於東涌新市鎮，地區領袖透過重新包裝東涌文物保護的社區運動，建立起社會網絡、社區身份認同及地區歸屬感。於文物保護運動中，地區領袖根據官方的論述，把東涌在時間歷史、地理空間及政治舞台上跟香港及中國的關係緊緊連繫。地區領袖以文物為平台，建立起社區勢力及地位，並與東涌舊社區築起關係。

最後，個別社會成員了解到新舊社區之間存在着矛盾，並意識到此矛盾和東涌的歷史是開拓營利及改善生活的重要資源，於是以出版地區報刊為平台，對東涌歷史展開論述，策略性地以東涌的過去來改善自身現在及將來的商業發展，並拓展社區人際網絡。

總結來說，不同社會能動者在特定的社會條件下，透過論述歷史及重建過去，鞏固現在及將來的社會位置，而效果各有不同。過去的歷史被不同社羣選擇性地記錄與捨棄，以滿足不同目的，有時與公眾和官方論述一致，有時卻不。

人們透過重新演繹過去來建構現在及將來的例子其實並不罕見。歷史記憶（historical memory）泛指人們如何根據現況及將來，構築新的歷史理解，以及這一過程如何影響政治和經濟利益的重新分配。歷史記憶能作為有效的參考指引，解釋人類的行為。因此，一直有不少人類學家從歷史記憶的視窗解釋社會現象，特別是關於國家身份的建構、集體禮儀的展現及國家文物的建立等。

法國社會學家霍布瓦克（Maurice Halbwachs）於1925年提出了「集體記憶」的概念，他認為，我們的過去是因就當下而建構的。³他又發現，涂爾幹（Emile Durkheim）所說的集體觀念多指有具體行為的活動，但現實中不少人群的集體記憶並不涉及集體活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法國歷史學家勒高夫（Jacques Le Goff）開始研究歷史記憶與集體身份認同的關係。⁴到了1990年代，學術界對歷史記憶的研究有增無減，不少學者以歷史記憶來解釋戰後的集體回憶及身份認同，其中包括James E. Young、Heidemarie Uhl及希克森（Walter L. Hixson）等。⁵這些學者的研究為歷史記憶的理論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讓我們了解到群體在面對社會轉變時的各種行為及現象。本文同樣透過歷史記憶的框架解讀在東涌出現的現象，所不同的是，本研究得出以下獨特的發現：

首先，大部份學者只關注羣體如何重新演繹過去，卻忽視表述過去如何影響現在及將來社會資源的重新分配以及不同群體藉着表述過去而渴望達到的社會目的。歷史論述其實是解決當前困局或建構將來的手段。第二，過去

3 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25.

4 Günter Bischof, Anton Pelinka eds., *Austrian Historical Memory & National Identity*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7), 5.

5 James E. Young, *The Texture of Memory: Holocaust, Memorials, and Meaning*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Heidemarie Uhl, "The Politics of Memory: Austria's Perception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the National Socialist Period," in *Austrian Historical Memory & National Identity*, 64-94. Walter L. Hixson, *Historical Memory and Representation of the Vietnam War*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2000).

的研究多指出，社會能動者的歷史論述往往與官方論述相違。然而，東涌的群體表現了一套特別的模式，他們不但沒有拒抗官方或公開的歷史論述，反而倒過來挪用這些論述建構自身的論述模式。第三，學者以往只關注國家層面的歷史記憶論述，忽視了地區性歷史記憶。事實上，地區中的不同社會成員正透過各種形式建立自身的歷史記憶。而各種歷史記憶的論述並不是固定不變的，反而是隨着不同社會條件而變動、融合或排斥。

本文將在第二節分析不同社會群體對東涌的論述（narration），並研究這些論述如何及為何被建立。透過了解不斷變動的官方及不同團體的歷史論述，可以掌握東涌的地區身份如何被定位。第三節則討論馬灣村遷徙以後，村內領袖出現的變化。新崛起的村領袖藉着運用有效的歷史論述，成功取得社會權力。第四節則指出，赤鱸角居民透過挪用官方「原居民」的身份論述，加固權力及促進融合。在此過程中，亦探究原居民如何透過資助外來宗教象徵，從而把新居民納入本地體制。這些過程牽涉不同社會成員互動的歷史論述，以及連串歷史和外在社會因素。第五節談及新市鎮文化遺產的挪用和新舊社區的融和，分析社會成員如何挪用、操控和重塑文物。文物成為新舊社區融和的工具，亦是本地領袖建立社會關係和網絡的籌碼。第六節以傳統節慶侯王誕為例，說明新舊兩個社羣的身份邊界如何被重新建構。

二、有關東涌的論述

當筆者問及香港年輕的一代「東涌在哪裡？」，他們大多回答「在東涌地鐵站的新市鎮。」他們似乎對東涌舊村落毫無認識。事實上，不同社會成員對東涌的論述一直在改變，論述本身就是變動的。本節先探討不同研究者和政府機構對於東涌作出的論述，並研究這些論述如何及為何被建立。最後，筆者會把不同論述模式置於大社會環境中作出比較。藉此我們得以了解，在過去的官方及機構的歷史論述中，東涌的地區身份如何被定位。

從1960年開始，香港學術界出現零零碎碎有關東涌的論述，這些論述集中討論東涌的侯王廟和東涌炮台。研究香港社會歷史的學術期刊*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中發表的論文顯示，關於東涌的紀錄都以東涌炮台為中心。以許舒（James W. Hayes）寫於1964年的文章為例，他詳細討論東涌炮台興建年份、炮台設備及用途等。他指出，東涌炮台建於1817年，由長度約69米、闊度約80米、高度約3米的圍牆組成，設有六台大炮。他還

認為，東涌跟分流和大澳是晚清時期清廷於大嶼山的重要軍事據點。⁶ 及至80年代，有關東涌的論述依然集中於東涌炮台。1982年，蕭國健發表文章對東涌炮台興建年份提出意見。⁷ 由此可見，1960年至1980年關於東涌的學術歷史論述多集中在炮台的軍事重要性，而有關東涌社區的社會生活論述乏善可陳。

80年代以後，關於東涌的論述改變了焦點。1989年，香港政府宣佈於赤鱘角興建香港新國際機場。當時，由香港政府領頭的宣傳論述中，東涌被形容為一個現代化的、先進的社區：

東涌新市鎮是為支援新機場而建設的新市鎮，市區包括完善的住宅項目和商業設備……⁸

以下，將集中討論四個不同角度有關東涌的論述，這些討論都是於新機場計劃公佈後發表的。

1. 從考古學角度論東涌

東涌及赤鱘角於1980年末至1997年之間成為大眾討論焦點，兩地被視為香港考古文物和文化遺產重地。此時，隨着連串考古發掘的開展，不少書刊和小冊子亦陸續出版。

香港博物館（香港歷史博物館前身）和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於1982至1985年期間於東涌進行了全面的考古調查。該調查的報告陳述「東涌是突出的考古地點，值得作更深入全面的考古發掘。」⁹ 1991及1995年，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跟多個學術團體合作，在東涌侯王廟附近進行考古發掘。發掘報告推斷，早於唐朝時期，東涌已有先民居住，主要從事農耕和捕魚活動，並與中國其他地區進行貿易。¹⁰

6 James W. Hayes, "The Tung Chung Fort,"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4 (1964): 146-150.

7 Anthony K. K. Siu, "More About the Tung Chung Fort,"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4 (1982): 305-307.

8 見"Hong Kong Airport Core Programme"網站，網站資料於2002年8月查閱，網站於2009年未能讀取。

9 B. A. V. Peacoc, T. J. Nixon, *Report of the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urve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urvey* (Hong Kong: September, 1986), 251.

10 Peter L. Drewett,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Antiquities and Monuments Office, Government*

另外亦有獨立團體，如香港考古學會，獲得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款，於1994年出版專書，發表有關在赤鱸角機場進行「拯救式」考古發掘的成果。發掘結果顯示，赤鱸角於六朝時已有先民聚居。¹¹到了2000年，東涌的考古文物成爲吸引公眾旅客的賣點。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出版的小冊子《東涌懷古》表述：「東涌炮台和侯王廟是值得遊覽的古蹟。」¹²

上述所見，東涌和赤鱸角於上世紀80年代以後，在公眾論述中被廣泛報導爲文物考古的重要地點，而隨着新機場計劃而開展的連串考古發掘，亦喚醒了公眾對兩地文化遺產的保護意識。

2. 從風水角度論東涌

香港政府邀請了前民政事務專員（District Officer）夏思義（Patrick Hase）研究東涌的社會歷史，他於1997年呈交了有關報告。¹³與其他研究非常不同，夏思義從中國風水的角度來看東涌。他對侯王廟特別感興趣，認爲該廟的風水反映東涌村民的信念及習俗。

3. 從社會文化角度論東涌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及歷史系合作，由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撥款，於1991年進行了關於東涌的研究計劃。該田野調查主要從社會文化角度記錄東涌的變化，並詳細記錄了東涌各村落的戶口人數及人口分佈。研究發現，面對社會及經濟轉型，東涌的家庭核心單位成爲聚合家庭成員的組織。¹⁴2002年，該研究小組領導爲了探視東涌10年以來的轉變，再次進行田野調查，並

of Hong Kong, 1996, A Tang Settlement and Qing Burial Site Sha Tsui Tau, Lantau Island, Hong Kong (Hong Kong: Antiquities and Monuments Office, AMO file number: AM 780220, Subject: Sha Tsui Tau Archaeological Site, 1996), Section 4, 1 (Unpublished manuscript).

11 The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at Chek Lap Kok*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 1994), 19.

12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Relics in Tung Chung* (Hong Kong: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ing Department, 2000).

13 Patrick Hase, *A Report on the History of Tung Chung and the Tung Chung Hau Wong Temple* (Hong Kong: October, 1997), 84, 86 (Unpublished).

14 Siimi Maria Tam, Chien Chiao, *Ethnographic Study of Family and Religion in Tung Chung Valley: Investigation Report* (Hong Kong: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3) (Unpublished manuscript).

把兩次調查結果進行比較。筆者有幸以研究助理的身份參與2002年的田野考察。是次考察主要探討東涌的家庭組織、經濟活動、宗教禮儀、社區活動、交通基建、教育及旅遊發展的演變。綜合兩次調查，研究小組出版了專書，補充現存有關東涌社會文化方面的資料。¹⁵

4. 從管治角度論東涌

東涌警署於2000年完成了《嶼北村落》的調查報告。¹⁶ 參與撰寫報告的警員表示，東涌警署從舊村落遷往新市鎮，同時管理舊村落和新市鎮的治安，為了有效管治，警員四出探訪，作口述歷史記錄，並把各村特色及人口數據仔細分析。報告內容清楚可見，東涌從管治角度被劃分成舊村落和新市鎮兩大範圍。

在建立新國際機場之後，陸續出現有關東涌的論述，這一現象跟當時的社會背景不無關係。根據研究香港新界區的學者華若璧（Rubie S. Watson）和華琛（James L. Watson）的觀察，80年代以前研究新界的學者並不多，隨着1997年香港回歸日漸臨近，人們對香港傳統文化及文化遺產的關注越來越多。¹⁷ 蕭鳳霞（Helen F. Siu）亦發現，回歸前後，市民及學者對身份認同、地方歷史及尋根溯源等問題份外關心。¹⁸ 在尋根的過程中，新界歷史成為重要的參考資料，不同學術機構、政府部門及考古學會相繼發起與此相關的田野考察及調查。

此外，香港政府亦於1997年前後大力推動香港的文化旅遊事業，本地文化遺產被視為推動旅遊的催化劑，而東涌及赤鱸角更被視為保留重要文化遺產的地方。

15 Siumi Maria Tam, Yip Hon Ming eds., *Tung Chung Before and After the New Airport: An Ethnographic and Historical Study of a Community in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Antiquities and Monuments Office of the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2005).

16 東涌警署，《嶼北村落》（2000，未出版物）。

17 Rubie S. Watson, James L. Watson, "From Hall of Worship to Tourist Center: An Ancestral Hall in Hong Kong's New Territories," *Cultural Survival Quarterly*, 21 (Spring 1997): 33.

18 Helen Siu, "Remade in Hong Kong: Weaving into the Chinese Cultural Tapestry," in *Unity and Diversity: Local Cultures and Identities in China*, eds. Tao Tao Liu, David Faur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6), 181.

三、馬灣村村民的歷史表述

馬灣村遷徙以後，村內權力結構出現變化。一名新崛起的村領袖在特定的社會脈絡和歷史條件下打進權力核心。這名新領袖由於掌握當時公眾論述的模式，有效地運用歷史記憶論述，最後成功取得支持。為了解遷徙後馬灣村的轉變，得先從過去說起。東涌共有14個村落，其中一個就是馬灣村。馬灣村村民被視為最早定居東涌的人群，村民為雜姓，主要姓氏包括樊、孔、何、鄭、莫及李姓。推行新機場計劃後，約共30戶需要被遷徙往新馬灣村。

根據村民憶述，其祖先於三百多年前已定居東涌，從事農耕活動。部份村內土地由「堂」擁有。「堂」是管理公共財產的地方組織，土地收入用作公共用途，如祭祖、嫁娶及喪葬等。英國政府統治香港以前，東涌並沒有村代表組織。一般而言，村務由長老掌管。長老負責管理的村務，包括排解糾紛、為儀式習俗提意見等。長老並非由投票選出，而是由村民以共識決定。

1899年，英國政府接管新界，並把新界劃作八大區和48個小區，每一小區有權選出一名村代表。1899年政府憲報顯示，當年馬灣村歸入「西島」區，村代表為樊姓村民。¹⁹香港政府於1946年建議於新界引入鄉事委員會及村長制，並於1952年正式執行。委員會由村長組成，管理地區事務。新制度下，東涌擁有14條村落，馬灣村和黃泥屋村統稱為「馬灣村」²⁰，第一名村長亦姓樊。除了樊氏，1966-1986年期間村長一職由孔氏出任，而1992年則由何氏出任。由此可見，樊、孔和何氏是馬灣村掌控權力的主要宗族。

新機場計劃中，馬灣村村民須被遷徙，原址將興建新市鎮公共房屋。1995年，政府官員到馬灣村確認村民的「原居民」身份。凡是擁有房屋土地的原居民，將獲賠償一幢三層高的新建村屋。最後，30戶居民被評定為合資格者並獲得賠償。

新馬灣村由多幢三層高村屋組成，村口的牌匾寫上村名，旁為村公所，村前後設保護神「伯公」的神位。一名村民指出，在跟政府斡旋的過程中，村領導的角色非常重要，而這位領袖，就是前文所述的阿周。

19 List of 'Sai Tao' district including the sub-districts and names of committee members, 15 July 1899,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Government Notification No. 387.

20 新機場興建以後，「馬灣村」被稱為「新馬灣村」。

(一) 憶述過去的模型

差不多每次跟阿周訪談，他都把馬灣村的源流不厭其煩地細訴一遍。他說，600年前，一名寡婦娣婆婆帶着三名幼兒移民到東涌安頓下來，她的三名兒子就是上嶺皮、下嶺皮和馬灣村的開村始祖。阿周強調，他是馬灣村先祖的後人，直至目前，他家裏仍然供奉着祖先的神位。

阿周能言善辯，在政府官員就賠償問題多次巡訪馬灣村時，他都負責接待工作。他一再把自身及馬灣村的源流傳說告知對方，而其中風水樹的傳說深具影響。

事緣政府官員打算把立於舊馬灣村村口的兩棵大樹砍掉，以進行新市鎮興建工程。然而，在多次會議中，阿周強烈指出，兩棵大樹是馬灣村的風水樹，是當年娣婆婆在樹下求神，才喜獲孫兒、開枝散葉的見證。雖然筆者在跟其他村民的交談中得悉不同版本的風水樹的故事，但阿周的論述被官員接納，官員更罕有地把兩棵大樹保留。目前，在東涌街頭可以看見這兩棵風水樹孤零地豎立在柏油馬路旁。

阿周的歷史記憶之所以被官方接納，關乎到整個社會脈絡。首先，正如第二節所述，夏思義呈交政府的報告從「風水」角度談論東涌，突顯了風水在地區管治的重要性。政府從風水角度破例順應村民的要求不無原因。第二，「九七」前後文化遺產備受關注亦為阿周的論述推波助瀾，正如一名村民所言，只要以保護傳統文物的理由跟政府力爭，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政府多數會讓步。

在遷徙以前，馬灣村並沒有村公所。據村民稱，以往舉凡要討論村內事務，一般都在村內一棵大樹前聚集。在遷徙的過程中，有村民認為有需要在新村內建立村公所，以讓村民獲得更多公共空間。不過，當時的村長阿辛一直被視為力有不逮，村民對爭取村公所一事並沒有信心。

阿周就在這樣的環境下冒起。在力爭村公所的過程中，阿周強調了村公所對馬灣村的重要性，並以實際行動證明村公所的必要性。他把自己擁有的一間荒置的小磚屋改建成村公所，作為在商議遷徙問題時村民聚合之場所。在遷徙前幾年，小屋起着馬灣村「村公所」的象徵作用。當政府官員巡視時，阿周堅持新馬灣村要有類似的村公所，以繼承馬灣村的「傳統」。結果，政府答應要求，並在新村內興建了一幢三層高、擁有空調和雲石牌匾的「馬灣村村公所」。1998年3月，新馬灣村入伙的第一天，官員及各村村長聚集村公所舉行慶祝儀式，村公所成為馬灣村款待外來賓客的重要地點。

遷徙後，村公所不但成為團結村民的象徵，而且成為與外界接觸的一個實體。阿周在遷徙過程中獲得村民的支持，並引起了村內權力結構的一些變化。1995年正值遷徙預備期，馬灣村舉行村長選舉，阿周獲得村內大多數人的支持。不過，在考慮健康因素後，新村長由阿周的年輕親屬出任。

阿周的冒起自有其原因，他本身在英國多年，見識較其他村民廣博。他留意時事，在政府收地興建機場時多種荔枝樹以獲大筆賠償。他精於與政府官員打交道，亦關心時事，深明社會對文物保護的關心。

此外，社會大環境同樣起了重要的作用。1980至90年代初，新機場興建計劃引起了社會對東涌文物保護的注視。1990年，政府宣佈保留東涌炮台和東涌小炮台。古物古蹟辦事處亦於馬灣村遷離前到村內收集文物。在官員收集文物時，阿周是帶領參觀者的人物之一。由此可見，阿周本身的背景和社會環境造就了適當的條件讓他冒起。這名新領袖比過去的村長擔任更廣的社會功能，他不但團結村內力量，還擔當着與村外聯繫的重要角色。

（二）弱勢歷史論述及遷徙錯置

並不是所有村民都藉着自身與社會條件在遷徙過程內獲得優勢，被邊緣化的社會個體有第一節提及的端婆婆。端婆婆由於沒有土地契約證明而被迫遷離家園。值得深思的問題隨即浮起，同樣是馬灣村村民，同樣力爭遷徙後的好日子，什麼因素令兩者的遭遇截然不同？

端婆婆與阿周對歷史記憶的論述非常不同。端婆婆在口述歷史訪談中，多次強調自身的過去。她指出，自小未受教育，「盲婚啞嫁」嫁入馬灣村後，天天辛勞耕田。曾誕下的四名子女大多不幸過身，現只剩身患腎病的兒子。端婆婆篤信侯王，每年侯王誕都參與其中。她說，只要祈求侯王，走失了的牛隻必可尋回。端婆婆的歷史論述是從自身出發的，完全沒有提及宗族源流和村內組織發展等。據端婆婆解釋，她的地契是被親友騙去的，她由於受教育背景限制，根本沒有能力了解事件真相。

1998年初，端婆婆離開生活了甚久的馬灣村，獨自搬到東涌新市鎮中的公共房屋。對於電梯、門鎖及電熱水爐，她都感到陌生。自從搬到新市鎮後，端婆婆對於自己沒有土地契約、未能與村民一起遷徙的事耿耿於懷，不敢再踏足新馬灣村，深怕村民看不起自己。不過，她一直渴望知悉馬灣村的消息。每天早上7時，她都會到新市鎮的酒家吃早飯，兼與東涌舊村落村民碰面談村內瑣事。她一直渴望政府體恤，讓她搬到新馬灣村，但她根本沒途徑申訴。她的

故事雖然廣為人知，卻沒有相關人士跟進，她能夠做的就只有等待。

2003年，筆者從村民口中得知一個好消息與一個壞消息。好消息是，政府決定體恤端婆婆，讓她安居於新馬灣村一間村屋。壞消息是，端婆婆在她的夢想實現之前已經過身了。

阿周和端婆婆的個案反映了歷史論述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賴社會條件及社會脈絡。阿周見識廣，跟政府官員關係良好，他掌握了社會形勢與環境。他對宗族起源與村落組織的論述正與政府、文物機構及社會關心的課題接軌。相反，端婆婆並不了解社會形勢，她僅從自身的角度論述過去，她的歷史論述正是政府和社會所不關心的，所以，她的申訴並未得到支持。

四、赤鱸角村的宗教壁壘和社區界線

1991年，赤鱸角島被夷平，村民要遷到東涌居住。村民離開小島的那天，把島上供奉的天后娘娘一併帶走。村民何三生全程統籌，在小艇上小心翼翼為天后護駕。可惜，小艇抵達東涌海岸時，東涌村民拉起橫額反對，指天后搬家沒有跟隨東涌的習俗，這種犯禁可能有害東涌村民平安。

在赤鱸角居民遷往東涌的事件中，赤鱸角居民為何被東涌居民排拒？赤鱸角原來的社會組織起了甚麼改變？他們如何融入新社區？赤鱸角與東涌兩個社區的關係又有何發展？

本節將指出，赤鱸角居民挪用官方「原居民」身份鞏固權力，以促進融合。在遷徙過程中，一名赤鱸角居民冒起成為村領袖，其中牽涉不同社會成員互動的歷史論述，以及連串歷史和社會因素。

（一）「原居民」身份的論述

赤鱸角島位於東涌以北海面約300米，島上約有五個小村莊，居民約200人，以務農和捕魚為生，主要姓氏為李、林、何、黃、劉及邱姓。1950年代以前，當地社會組織結構較為鬆散。

根據1899年香港政府的劃分，赤鱸角跟東涌同屬「西島」地區，而西島再細分為東涌的14個村落和赤鱸角的一個村落，由於每村可選出一名村代表，因此西島內有14名東涌代表及一名赤鱸角代表。據島上居民指出，當時東涌與赤鱸角之間的關係疏離。1952年，政府實施鄉事委員會制度，赤鱸角被納入東涌鄉事委員會，委員會由12名東涌代表和一名赤鱸角代表組成。赤

鱸角村民告知，1952年島上選出第一名代表，由於當時並沒有規定代表的身份必須為「原居民」，因此一名叫王華的非原居民當選。

宣佈新機場計劃以後，政府正式宣佈赤鱸角遷徙行動，並於東涌興建「赤鱸角村」。島上194名居民被劃分成「原居民」、「長居民」和「非原居民」，原居民可獲安置於赤鱸角村；長居民指於島上長久居住的人，同樣可獲新村安置；而非原居民則需要遷往市區其他地方。最後，島上只有三戶，共12人合資格安置於新赤鱸角村，他們分別姓何、邱及李，當中只有何氏被界定為原居民。

新赤鱸角村村口豎立一牌匾，上面寫着村民如何憑勇氣建立家園，署名為何姓的三生。三生向筆者解釋，牌匾內容讓他銘記遷徙過程中原居民身份的重要性。事實上，他的抗爭從新機場計劃開展時已經起步。何三生表示，政府在確認原居民身份時，只承認擁有族譜紀錄或地契的書面證明。由於他沒有在祖先留下的地契上續名，他的原居民身份成疑。他憶述：「當時十分驚訝，才發現原居民身份原來如此重要！」他於是花巨款聘用律師跟進案件，最後辦妥手續，原居民身份獲得證實。「自此以後，每有政府官員到島上巡視，我也仔細告訴他們我在島上的歷史，並強調原居民身份。」²¹ 他開始向筆者訴說他的祖先如何從廣東沙灣來到赤鱸角島定居、他的族譜如何於日軍佔領香港時被燒毀的故事。

1995年，新赤鱸角村選舉村長。該村「長居民」雖然獲得安置樓房，但平日住在市區，村內事務多由何三生主理，因此他順利當選為村長。

何三生成為新赤鱸角村的新領袖，跟他不斷強調自身的原居民身份有關。由於官方採取以原居民與非原居民身份來設定賠償準則，何三生挪用此概念重新書寫赤鱸角島的生活。在他的歷史論述中，島上的生活以原居民與非原居民的界線區分。他指出，由於島上非原居民佔多，過去村內事務一直由非原居民主管，非原居民王華於1952年當選代表就是一例。遷徙以後，何三生認為非原居民掌控的年代應該過去，由原居民管理新村是合理不過的事。

（二）反對天后進入東涌的抗爭

根據遷徙安排，政府計劃把天后廟按原來模樣整間搬到東涌重建。1991年，該廟被拆卸，分成101塊花崗石，刻上編號，再於1994年在東涌重建。重

21 訪談於2001年在東涌進行。

建後，天后廟屹立於新赤鱗角村前，廟前懸着寫有「天后宮」、「建於1823年」等字句的牌匾，祭壇前垂掛着由何三生捐贈的紅色布條。

何三生指出，天后是赤鱗角島上主要供奉的神靈，天后娘娘曾經拯救赤鱗角島先民。在島上，並沒有特定的組織打理天后廟，村民自發捐獻，並由一名林姓村民出任廟祝。每年農曆二月二十三日，赤鱗角島的村民會舉行慶祝天后誕活動，由村民捐款組織，一直沒有任何東涌居民或政府官員參與活動。

遷徙以後，天后廟卻不再是島民的本土象徵，而被賦予更廣泛的社會意義。新機場遷徙計劃公佈以後，赤鱗角天后廟的原廟搬遷成為社會上受關注的議題。其時，香港面臨回歸，社會人士正在思考有關香港身份認同和本土意識等問題。當時，政府和考古團體在赤鱗角發起連串考古發掘；結果，赤鱗角被認為是「擁有悠久歷史的地方」。²²與此同時，政府古物古蹟辦事處亦積極提出保留天后廟的方案，以免古蹟毀於推土車下。因此，赤鱗角的天后廟被廣泛形容為「本港最有特色的天后廟」和「最具價值的天后廟」。²³

（三）天后被拒

1991年，在整個天后廟搬遷過程中，何三生是唯一一個全程參與的赤鱗角村民。官員到島上視察時由他講解，把天后帶到東涌時亦由他領航。天后廟抵達東涌的第一天，由於受當地村民反對，天后廟的花崗石塊需要暫放在東涌康樂中心達三年之久。期間，何三生每逢初一、十五都獨自到康樂中心供奉天后。由於東涌原居民一直供奉侯王，因此天后處於邊緣位置。

1994年，天后廟重建工程正式完成，赤鱗角村村民亦相繼入伙，政府決定資助當年的天后誕活動以示慶祝。東涌鄉事委員會答應與赤鱗角村村民攜手合作組織誕期，並向村民籌得十多萬元資助。於赤鱗角村天后廟前舉行慶祝天后誕活動，政府官員、東涌鄉事委員會及赤鱗角村民首次聚集慶祝。隨後直至2000年，東涌鄉事委員會一直資助天后誕慶祝活動，每年約近百名東涌居民參與。直至2001年，東涌鄉事委員會提出改在東涌的馬灣村舉行慶祝天后誕，並

22 William Meacham,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on Chek Lap Kok Island*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 1994), 286.

23 司馬龍，〈赤鱗角天后宮〉，《文匯報》，1991年6月27日；魯金，《香港廟趣》（香港：次文化堂，1992），頁179。

在馬灣村大排筵席。這一建議令赤鱸角村村長何三生非常生氣，他認為，東涌鄉事委員會恃着財雄勢大，提出無理要求，目的是操控天后誕活動，因此他最後決定拒絕委員會的要求。

一名東涌鄉事委員會委員指出，天后誕活動多年來是委員會的財政重擔，該會老早就不想再資助天后誕活動。結果，天后誕活動自此以後停辦，而赤鱸角村跟東涌鄉事委員會的關係亦日趨惡化。

總括而言，重點有三。首先，赤鱸角村領袖何三生於遷徙後冒起，主要由於他的歷史論述，正符合當時政府對原居民及非原居民的概念界定。在這樣的身份界線下，過去島上的記憶包括社會組織結構、權力結構以至地區界線，全由原居民及非原居民的概念出發和理解。值得注意的是，原居民及非原居民的劃分是遷徙時政府所採納的論述方式，島上的生活並不一定由這樣的界線區分。此外，隨着三生挪用公眾論述的概念，他的社會權力得以提升，並擁有足夠爭議權力跟東涌鄉事委員會斡旋，最後直接影響赤鱸角村融入東涌的過程。第三，社會力量和社會文化脈絡直接影響兩個社羣的融和。赤鱸角的天后廟和天后誕被當時的社會視為香港文化遺產的象徵，這些象徵一方面成為強化赤鱸角村村民身份認同的導體，一方面亦把他們與東涌居民的身份界線區分開來。由於天后得到社會廣泛的認同，天后神像進入東涌的舉動對東涌居民而言無疑是個挑戰。東涌居民初期資助天后誕，明顯是想透過資助外來宗教象徵，計劃把對方納入本地體制，並予以同化。當赤鱸角村拒絕東涌鄉事委員會把天后誕活動納入當地體制的時候，雙方的關係最終破裂。由此可見，兩個群體的關係跟外在社會條件息息相關。

五、東涌新市鎮：文化遺產挪用和社區融和

東涌新市鎮內建有多幢公共房屋、購物商場、私人屋苑和地下鐵路運輸系統，地區風貌與舊村落截然不同。東涌原居民村落以侯王廟為中心，而新市鎮則以購物商場為社區集中地。新市鎮居民主要由香港市區遷入，大部份居於由政府房屋署分配的公共房屋。2001年全港人口普查資料顯示，新市鎮居民共有18,598名。²⁴

新市鎮居民面對着種種社會問題。一名居民曾向筆者訴說，初到新市鎮有如開荒牛，新市鎮社區設施不足，青少年及初來港人士面臨適應新生活的

24 政府統計處，2001年人口普查。網站資料於2003年10月查閱，網站於2009年未能讀取。

難題。由於東涌舊村的原居民深怕政府把資源投放於新市鎮而忽略舊區，因此對新來者有所抗拒。而新市鎮居民亦對傳統鄉村風俗感到陌生，於是兩個群體之間開始產生鴻溝。

這種社會現象為連小姐提供了冒升的機會。連小姐於新界大埔長大，年輕時曾參與不少工會及婦女運動，為低下層市民爭取權益，後來以修讀夜校形式獲得國內大學學位。1980年，她嫁給一位新界離島大嶼山長洲「原居民」，並搬進大嶼山居住，自此跟農民和漁民打成一片。1994年，她首次當選離島區議會議員，辦公室設在梅窩。1997年，隨着新市鎮落成，她搬到東涌居住。兩年後，她再度當選離島區議會議員，是首名於東涌新市鎮設立議員辦事處的議員，並目睹整個新市鎮的誕生。2003年，連小姐成為離島區議會副主席，她一直受到大嶼山原居民的支持。

2001年，連小姐於東涌新市鎮舉辦了大型的公開活動，名為「新城古鎮話東涌」，希望把新舊地區的居民拉攏在一起。在籌備活動的過程中，連小姐先發起了一個舊村落文物收集活動，這一策略成功贏得原居民和新市鎮居民的支持。當時，筆者以研究生身份參與文物保護的籌辦工作，擔任文物收集活動的研究助理。

2001年9月初，連小姐、她的兩位助理和筆者開始徵集文物。我們一行四人到東涌舊村落探訪。村民對文物收集的反應各異，有的願意借出歷史悠久的日常用品，有的則拒絕。其中一名村民超伯對捐獻特別熱心，他曾經在媒體亮相，被視為本港最後一位以種植稻米維生的農夫。超伯帶領我們到存放各種擁有悠長歷史的農耕工具的雜物房，並讓我們選擇具文物價值的常用物品。不過，在挑選文物的過程中，連小姐強調為配合展出，文物必須是「不太笨重」和「古舊」的。雖然超伯一邊指劃，一邊說巨型石磨對農夫來說非常重要，連小姐卻表示受制於展出場地，石磨未免太礙地方，不予接納。另外，超伯拿出一盞油燈，並表示每天把它帶上稻田，不過，連小姐說那油燈看起來未夠「古舊」，放棄借取。由此可見，連小姐界定文物的準則，主要受制於展覽的場地和主題。

在與村民接觸的過程中，連小姐建立起與村民的關係，並在輾轉介紹下，認識了更多東涌的原居民。在原居民的支持下，最後約近50件文物被選出。

2001年11月，收集得來的文物於東涌新市鎮富東商場展出。展品分成多個類別，分別為農耕用具、捕漁用具、廚具、日常用品、嫁妝、飾物、獎杯、舊照片及契約收據等。其中，農具被放置於最當眼的地方。筆者還記得，當日走訪超伯時，他把農耕生活娓娓道來、情動感慨，可惜，展覽中超

伯的農具卻被物化。農具旁沒有寫上物主的姓名或背景，只標示「不准觸摸」的字眼，超伯的經歷亦被一句「東涌農夫用具」所帶過，去掉個人化（depersonalized）的特殊背景。

藉着重新界定及展示文物，連小姐重建東涌昔日農耕生活的面貌。由於展品根據時序展現，東涌悠久的歷史進程被一再強調，由農村過渡至新市鎮的時間線被清楚勾勒。展品在這樣的方式下展現，參觀者並沒有關注展品背後的個人化經歷，反而取得一個清楚的印象——東涌是個由農村演化至今日先進新市鎮的地區。對於新市鎮居民，他們從文物展中一方面對過去的農村社會多一分了解，一方面更確定新市鎮與舊村落的差異，從而建構一個獨特的社區身份認同。

展覽場地中，有18塊展板豎立於長走廊內，內容論述東涌如何從原始社會進展至農村社會，最後成為鄰近機場的新市鎮。筆者以活動研究助理的身份負責撰寫展板內容，根據歷史文獻制訂初稿，並由連小姐作出審批。

其中一段描述東涌的內文大意是這樣的：大嶼山的歷史相信可追溯至遠古，東灣仔、馬灣、沙螺灣等先後由考古學家發掘出不少古物。經過連小姐的修改，文章最後加插了一段，大意是指發掘出來的古物來自廣州，反映大嶼山與中國大陸的密切關係，香港與祖國之間進行着頻繁的商貿活動等。

從修改後的版本可見，連小姐一再強調東涌與中國的關係，把本土歷史記憶與國家歷史記憶掛勾。事實上，自回歸日近，香港不同社會成員發起愛國熱潮，彰顯東涌與中國的關係，有助強化居民愛國愛港的意識。

「新城古鎮話東涌」其中一個活動是在富東商場外的公開表演。當日下午，近2,000名來自舊村落及新市鎮的居民聚首一堂，觀賞不同的文娛表演。其中一幕由四名農婦穿起農村裝束表演歌舞，展示東涌農村生活片段。她們下台後告訴筆者，她們並非東涌人，而是來自長洲的表演者。

表演結束後，多名政府官員發言。其中一名指出，東涌是個歷史悠久的地方，現在演變為新市鎮，加上昂坪360和迪士尼樂園，將來必定發展成文化旅遊景點，把歷史文物展現到旅客眼前。

整個表演活動中，東涌一再被塑造成一個具歷史感的旅遊景點，東涌成為香港整體的旅遊焦點。東涌自身的地區身份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香港文物的象徵。

至於連小姐，則一再重申活動是連繫新舊社區的橋梁。她透過東涌文化遺產的重新論述，為新舊社區建構起身份認同。在這次活動之前，從來沒有同類活動把新舊社區兩個社群拉攏起來。連小姐說，有需要為兩個社群建立

起共同的集體記憶及身份認同，以建立和諧共融。事實上，透過這次活動，社會組織的確更為緊密，新舊社區的政府官員和民間組織都積極參與。

根據社會脈絡來看，活動與政府的文物運動相和應。香港旅遊發展局於2001年發起多個旅遊活動，以宣傳香港的歷史文物為目標。而2002年政府亦推廣「大嶼山月」，把大嶼山推廣成旅遊熱點。活動依據官方論述的概念，把東涌塑造成全港歷史文物的推介重點。

總的來說，活動展示了在特定的社會條件和脈絡下，社會成員如何挪用、操控和重塑文物。文物同時成為新舊社區融和的工具，而本地領袖藉着文物展示活動建立起社會關係和社區網絡。

值得深思的是，文物是指誰的文物？文物運動為誰而發起？在整個挑選、展示和論述文物的過程中，文物並不一定與原居民的普遍認同相符。文物的「真確性」成為次要，反而帶着複雜的社會意義。展示文物活動不但成為重塑及重新演繹過去的平台，還可重構現在和將來。

六、分裂的社區：新與舊相遇

2002年，一羣來自新市鎮的年青人在東涌新馬灣村一間網吧外鬧事，最後要出動警方排解糾紛。這事件令新馬灣村原居民非常不滿。翌日，來自新市鎮的網吧東主主動拜會新馬灣村領袖阿周，阿周向對方說，原居民一向有悠久的習俗和生活習慣，網吧24小時營業，打亂了原居民的鄉郊生活。網吧東主深明要繼續在村內營業，必須得到阿周允許，最後向阿周道歉，並承諾依照原居民風俗辦事。

這一事件說明，當初到貴境者遇上原居民，不同的社會紛爭和社區界線慢慢湧現。本節先介紹一名新市鎮居民如何透過出版本地報刊，嘗試論述東涌的過去，並藉着出版連繫新舊社區。另外，亦以東涌的傳統神誕侯王誕為例，說明新市鎮建立以後舊社區出現的變化。

（一）《東涌報》：過去是將來的策略

阿班，新市鎮居民，跟其他新居民不同，他並沒有身份認同的危機，反而了解到東涌的歷史可以是有助自己發展事業的社會資源。阿班自資出版地區報紙《東涌報》和設計了東涌網站，介紹東涌的歷史和社區現況。

阿班是第一批搬進新市鎮公共房屋的居民，起初如開荒牛一樣面對種種

適應問題。他爲了生計，曾經在街頭當小販售賣熟食，後來以上門維修電腦維生。由於在適應新生活時得到本地團體的幫助，阿班認識到互相幫助的重要，並決定爲新市鎮出一份力，協助新居民生活。1999年，他成爲公共房屋東盛樓互助委員會委員，2001年更成爲委員會主席。爲了讓新居民了解社區，他出版地區報、設計網頁和組織社區文娛康樂活動。

《東涌報》的其中一欄定期講述東涌舊村落的傳統文化，侯王廟、侯王誕及天后廟等成爲主要內容。東涌的歷史被包裝成爲旅遊賣點，引起新居民遊覽的興趣。另一篇文章提及新舊兩區的界線，文章以中國農曆新年爲例，指新居民的慶祝活動較爲簡化，相對而言，原居民傳統慶賀習俗複雜得多。報刊內容處處突顯了新舊社區的差異。阿班曾跟筆者說，兩個地區的差異反而有助他事業的建立。他渴望於東涌建立旅遊事業，以古舊的歷史吸引新居民。事實上，他近年在東涌的確非常活躍，透過組織活動與新舊社區領袖建立起廣泛的人際網絡，這與他對歷史論述的敏銳不無關係。

（二）侯王誕的演變

2002年，筆者認識了一位與女兒一同來求神的女士。她們是新市鎮居民，據說侯王靈驗，特地到東涌侯王廟求福。2003年9月的侯王誕，筆者再次碰上該名女士。她興高采烈地跟筆者說，她捐了一個銅鑄的香爐給侯王。筆者望向香爐，卻不見根據原居民傳統的做法，把捐獻者名字刻在爐側的印記。她說，原居民一直視新市鎮居民爲「外人」，因此她不敢把名字刻在爐側，只偷偷刻在爐子底部。她強調，慶祝侯王誕雖然是公開活動，但她強烈感到神誕是由原居民操控的，其他人都是「外人」。

要了解侯王誕近年的轉變，得先從誕期活動談起。筆者曾於2001年參與侯王誕，當時誕期於農曆八月十六日開始，不過，根據原居民所指，從前的慶祝侯王誕活動曾在農曆八月初舉行。2001年，侯王誕的第一天，侯王廟以鮮花和花牌裝飾，廟前放置一個臨時的小型竹棚，祭台上供奉着赤鱗角村天后廟的天后神像。侯王廟對開的草地上，以竹棚搭建了一個戲台，草地上圍滿售賣小食和香燭的小販。東涌鄉事委員會的成員向侯王神像祈福後神誕活動正式開始，當晚亦開始上演一連多天的神功戲。第二天晚上，約900人筵開約75席，村民多分村而坐。席間同時舉行金器及神物拍賣，籌得款項做作神誕活動支出。另外，村民以「堂」爲單位組織了15個花炮會，有的以某村爲單位，有的則以某村的一群村民爲單位，不同的花炮會在侯王廟外的草地上

搭建竹棚，以供奉神靈和進行宗教儀式。第三天日間的時候，村民於侯王廟外舉行大型活動，莫家村近100人表演傳統舞龍，並由離島區議會、東涌消防局、寶蓮寺、大嶼山各區區議會及東涌警署等官員和鄉紳參與。第四天中午開始舉行搶花炮活動。1949年以前，村民互相爭奪花炮引致連串械鬥，後改以投標形式舉行。

這一連串的活動跟過去歷年做法大同小異，但參與者在近年卻起了很大的變化。一名原居民指出，侯王誕過去是東涌原居民的鄉村誕期，參與者主要是當地人，自從新市鎮建立以後，侯王誕成為公開活動，新市鎮不同組織均派代表參與，新市鎮居民亦大批湧至，令參與者新舊混雜。有一名村民更對筆者說，慶祝侯王誕是村內事務，有權力的村民一直排拒新市鎮居民「官方地」參與組織誕期。目前，除非得到原居民邀請，否則新市鎮居民不得參與晚宴，連觀看神功戲亦必須以原居民優先的原則執行。

在2001年侯王誕開幕的致辭中，東涌鄉事委員會主席亦一再重申，侯王誕是東涌原居民的傳統節慶，並藉着官員蒞臨，提出舊村污水及土地運用的問題，以及把舊村發展成旅遊重點的建議。但是，他的整篇說辭中，並沒有談及新市鎮的發展。

東涌原居民的看法讓筆者明白為何那名新市鎮女士不敢把名字刻在爐側。事實上，現場所見，新市鎮居民只在小販檔前徘徊。

侯王廟前的空地是一大片草地，直至1960年代，該土地用途成為村民關心的焦點。根據當時的政府檔案顯示，侯王廟前的道路是村民常用的通道，村民多次要求政府修路。²⁵ 村民亦成功要求政府在空地建一小型運動場，讓村民得以進行康樂活動。2001年，東涌遊樂場和東涌康樂中心建成，由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管理。

不過，今天侯王廟前的空地不再是東涌原居民的公共空間，反而成為旅客的聚集點。廟祝阿清告訴筆者，目前，東涌原居民已很少到侯王廟求神，只在農曆初一、十五較為人多。平日，侯王廟成為來自市區旅客的旅遊點，廟內不少大型香燭均是由「外人」捐獻的。阿清說，侯王廟已由地區廟宇慢慢演變成旅遊景點。

另外，一名原居民亦在侯王廟附近開設了燒烤場，他說要利用旅遊熱，把東涌的文化遺產轉化成生財工具。而第五節所述的區議員連小姐亦同意，

25 Public Records Office, D.O. Tour Report—Lantau: Tung Chung Area (General Correspondence files C.N.T.A.), File No.: HKRS 407-1-12, 17th August, 1963.

侯王廟是東涌旅遊景點，她正積極向政府要求重鋪路面及改善交通。

總括而言，不同社會成員正以不同的方式演繹侯王誕及侯王廟，有新來者把東涌的過去視為社會資源，建立自己的事業；有原居民竭力保持傳統勢力，藉着操控侯王廟及侯王誕，排拒外來者干預傳統文化，並清楚劃分社區身份及界線；亦有新市鎮居民在誕期活動中被邊緣化，無從參與。結果，新舊兩個社群的身份邊界黑白分明。

七、總結

一名東涌村民跟筆者說，新機場就像一枚炸彈，從天而降，把過去的秩序破壞得七零八落。有些人相信，過去是靜止的、固定不變的；同時卻有人相信，過去是含混的、可以重塑的。對於後者來說，在建立新生活的同時，重建過去是適應現在及鞏固將來的途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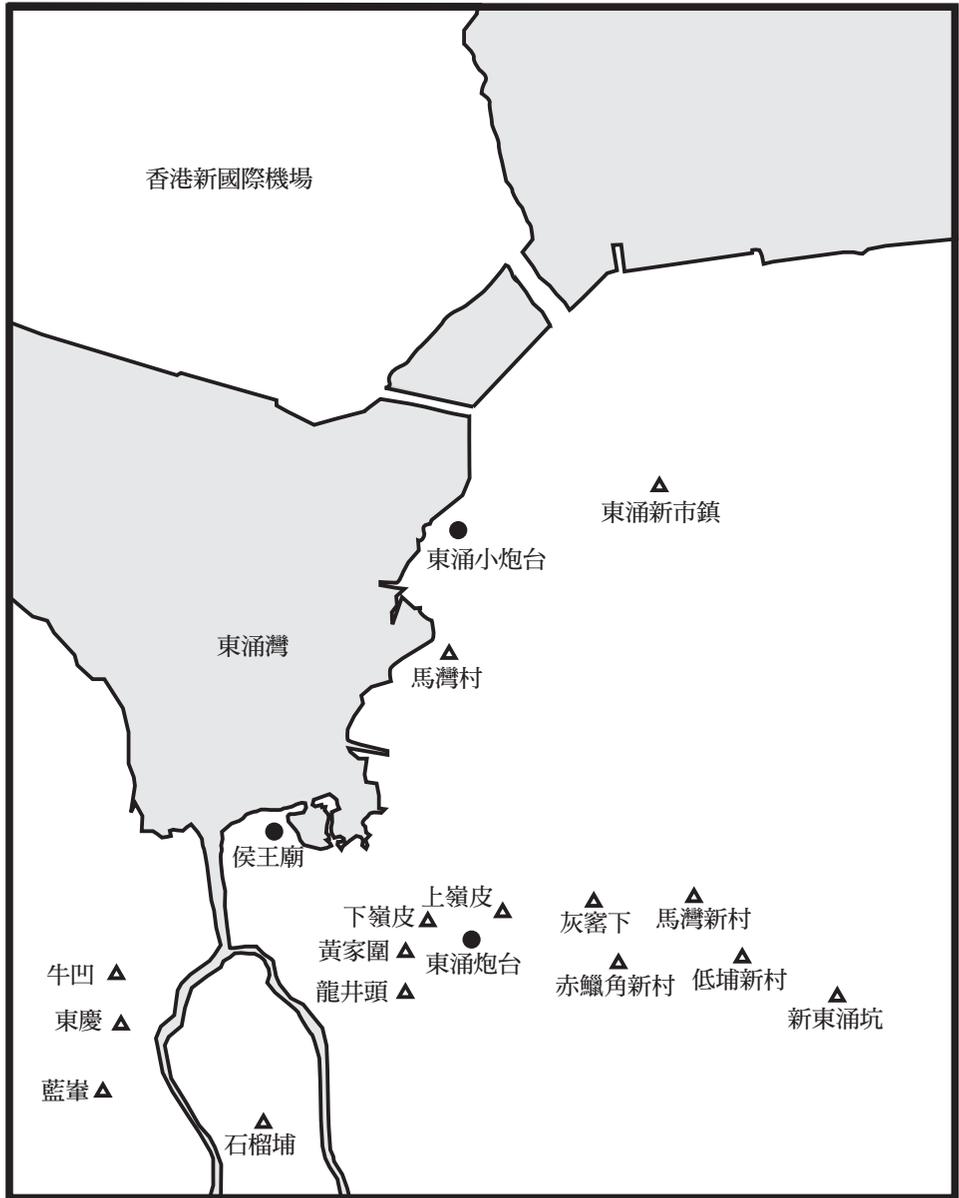
歷史記憶是個窗口，為東涌複雜的現況提供一個視野。在本文第二節中可見，歷史論述並非靜止的，不同的論述模式取決於誰在論述和為誰論述兩個重點，而歷史論述亦跟大社會的整體脈絡息息相關。第三至第六節之中，筆者描述了東涌不同社會成員的歷史論述方法及模式，這些模式根據不同的社會文化脈絡而不斷轉變、產生互動。研究發現，赤鱸角及東涌村民的歷史論述不但為了憶記過去，還在於鞏固將來。正如康納頓（Paul Connerton）所說，我們對今天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我們對過去的演繹，我們對過去的認知讓我們確保現在的社會秩序。²⁶另外一個發現是，東涌居民的歷史記憶不但沒有排拒官方的歷史論述，反而挪用官方的概念建構歷史記憶。而他們重建的歷史記憶，正如James J. Fentress及Christopher J. Wickham所說，都是零碎的、具選擇性的、扭曲甚至是不準確的。²⁷一般學者把歷史記憶分成個人、公眾及官方的，然而，通過對東涌的研究發現，這三種歷史記憶並非獨立，而是互動的，處於互相爭奪和妥協的矛盾關係中。這些歷史記憶模塑了新的社會權力、社會界線和社區身份認同。

（責任編輯：嚴麗君）

26 Paul Connerton, *How Societies Rememb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3.

27 James J. Fentress, Christopher J. Wickham, *Social Memory* (Oxford: Blackwell, 1992), xi.

圖一、香港新國際機場（為赤鱗角島原址）、東涌舊村落與新市鎮：東涌新市鎮毗連東涌舊村落的馬灣村原址和新馬灣村。



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地政總署測繪處繪於1998年，地圖編號9-SE。

Historical Memory and Relocation around the New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Hoping AU

Abstract

The completion of the new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1998 caused the relocation of several villages in Chek Lap Kok and Tung Chung and the building of the Tung Chung New Town nearby for new settlers from urban areas. This thesis examines how the 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memory by the native villagers, the new settlers, government heritage institutions and commissioned researchers affected the building of new lives after relocation.

In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official distinction between “indigenous” and “non-indigenous” residents in the relocation project, those villagers who were articulate in narrating the past in terms of communal settlement history became local leaders in the relocated villages. The publicity in mass media about the restoration of a local temple for heritage preservation reinforced the communal identity of a relocated village and affected its reintegration with the old Tung Chung community. By re-packaging the heritage of old Tung Chung villages in exhibition and local newspaper, local elites in the New Town attempted to construct communal identity and social networks. Through limiting the new settlers’ participation in the festival of the patron god of Tung Chung, native villagers managed to demarcate their communal boundary excluding the New Town by narrating their heritage.

Hoping Au currently works for a local government in Australia as a heritage officer. E-mail: hoping.au@gmail.com.

The previous studies on relocation in Hong Kong often focus on the community's history and the situation after relocation separately. This thesis argues that the link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in terms of how people construct and manipulate their historical memory in relation to the present and future is important for our understanding of how people build their new lives after relocation. Unlike many studies about the local community's resistance against official or public narratives about local history, the cases in this thesis show how local communities appropriate official or public narratives for constructing their own historical memory.

Keywords: historical memory, relocation, community identity, historical narration